

中学是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基础教育，我们更应强调提高全民族素质这一根本目的，同时为培养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人才打基础，作准备。如果离开提高民族素质来谈培养人才，或者把这二者割裂开来，认为一部分学校是为提高全民族素质服务的，一部分则是培养人才的，那么我们的教育从方针、布局到具体作法，都会出现严重问题。实际上，人才的层次越高，应当是基本素质越好，事实正是如此。

这个问题也不单纯是个理论问题，在教育实践当中，涉及到如何处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关系问题，能力培养与智力开发的关系问题，课内与课外的关系问题，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问题，以及培养学生哪些基本品质，对教师的基本职责应当如何要求等问题。实际上，所谓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大概原因也在这里。

教育危机首先是师资危机

要办好教育，除了方针和管理之外，最根本的是要有好的师资。

现在讲“教育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危机首先就是教师危机。

目前教师当中的问题主要有几个：

一是数量不足，主要缺高中教师，缺外语等科教师。

二是质量不高。目前学校教师从年龄上大体分三种。45岁以上的，是50年代或60年代的大专毕业生或高中毕业留校生。他们家务负担重，身体状况不好，但仍然担负着最繁重的工作，多数质量较高；30岁至40多岁的，多是十年动乱期间出来的，工作总的来说很努力，但知识面窄，“划地为牢”，突击进修取文凭，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法水平低，素质不大好；30岁以下的，多是近几年的大学毕业生，许多不安心教育工作，起码的职业道德、“为人师表”不够。

三是生活待遇低，有许多实际困难解决不了。与其他系统比，不合理之处甚多，这是人所共知的。

面对这种状况，当校长的要用大量时间跑教师来源，提高教师福利，解决教师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解决教师在教学中一些本不该出现的问题，解决教师中的各种矛盾，没有更多时间研究办学方针和教学改革的问题，根本谈不上办出有特色的学校来。这是我们经常苦恼的事情。

解决教师问题，核心是教师待遇问题，只有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才能吸引人才从事这一工作。那些高喊重视教育的人当中，有多

少人的子女从事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既然讲“初级阶段”，就不能只用“崇高”来吸引人才。

现在中央提出，为了解决中小学教师待遇问题，各校可以搞勤工俭学。我认为，这是很困难的，少数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作到，但普遍来说，就一般学校和农村学校来说，这条路太难走了。因为学校校长、教师是搞教育的，不大会搞经济；同时，现在竞争激烈，许多拥有雄厚基金、设备、技术、人才的企业都煞费苦心，一所普通中小学哪能具备这种条件？这样作，势必分散学校精力，影响教育质量，而到头来也不一定搞来多少收入。目前北京市中小学的情况正是这样。所以，虽然在这方面有若干宽松的政策，恐怕毕竟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归根到底，还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彻底想通教育问题，钱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随便举一个例子，不少大单位职工住房一批批地建，有的已解决到第二代。能不能大大压缩一下，然后再拿出一笔钱，集中力量为教师盖一批房，以求缓解目前极为紧张的教师住房问题，我觉得这并不太难，仍然是领导是否重视、肯否下决心的问题。

正视普通教育潜在的危机

FACE UP TO THE POTENTIAL CRISIS IN GENERAL EDUCATION

清华附中校长 万邦儒

我长期在中学工作，近年来看到普通教育潜伏着严重危机，深感忧虑。

一 中学师资队伍严重

老化，后继乏人。

清华附中1986年度有教师121人，平均年龄近44岁。1987年达到退休年龄的11人，其余教师到1997年前要退休的51人，这就是说十年内将有62人退休，占全体教师的51%。北京市101中学现有教师118人，45岁以上的63人占53%，已到退休年龄的7人，到1997年前要退休的47人，也就是说十年内将有54人要退休，占全体教师的45%。

这个数字在北京市有一定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将要退休的教师，绝大多数是当前中学师资队伍中既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而又具有丰富

经验的骨干教师，是各学校工作中的顶梁柱。这批教师退休，将意味着十年动乱前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全部女教师和绝大部分男教师都将离开中学岗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1966年到1982年间，中国高等学校只有学习过两年到三年、程度严重不齐的毕业生。因此，当前中学师资队伍断层现象十分严重，不少学校缺乏30~45岁之间的合格教师。

1982年起，中国重新有了受过系统培养的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但由于多年来国家机关、高等学校和科研、出版机构都缺人，他们中很少分配到中学。而分到中学的少数毕业生，也在经过两三年后纷纷离开了教师岗位。

清华附中在十年动乱后，委托清华大学举办了一个中学师资班，从中留下了7名教师。除此之外，从1982~1986年共分配来大学毕业生25人，到1987年已经离开了14人，占56%。他们的去向是出国3人，到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6人，到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司4人，考研究生1人。总之，14人全都离开了普通教育的岗位。留下的11人中，至今还有3人不安心。清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1982~1985年共分配来大学毕业生22人，到1987年也有16人离开，占72%。这个现象在北京市和全国都有普遍性。许多中学近年来根本分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生。师资队伍后继乏人相当严重。

师资队伍后继乏人，还表现在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不愿报考师范院校。1986年我在清华附中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大张旗鼓地动员学生报考师范院校，结果在230名毕业生中竟无一人第一志愿报考师范。1987年、1988年师范院校提前招生，清华附中虽然每年都有十多人至二十人报考，但他们的学习成绩都是中等偏下，甚至是差的。没有良师，何来高徒！

大学毕业生不愿到中学教书，优秀中学生不愿报考师范，根本的原因仍然是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报酬低。尽管国家这两年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和地位，但至今仍未能根本扭转这个局面，教师待遇仍是各行业中最低的。在采取的一些政策性措施中，存在的问题也还不少。例如中学教师职务，高级教师也只相当于副教授，工资最高只有190元，比大学及中等专业学校的副教授最高工资230元少很多。有的年青教师问，为什么中学教师教得再好也评不上教授？国家公费医疗制度规定大学教授和行政上的司长局长以上干部可以享受“102门诊”待遇，而中学教师和干部干得再好，也无一人够格。一些分到中学的大学毕业生说，看看干了几

十年的老教师 and 老校长，待遇也不过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干头呢？难怪有的班主任不愿动员优秀中学生报考师范，甚至有的说我再也不干这种坑害学生一辈子的事了。

山西省偏关县教育局一位同志讲：“县里文化层次最高的人才在教育口，但教育口的地位和经济收入却最低，他们没有工资外的收入。青年教师总想改行，只要跑出教育口就行。离开教师岗位，用不了多久，经济就会好转。我从当教师转到教育局当干部，就好多了。”

二、中学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国家拨的教育经费，连学校的 正常运行都维持不了。

清华附中近几年来国家拨的教育经费基本上没有增加，而且还略有下降。如1985年为43.2万元，1986年43.2万元，1987年42.7万元。而学校开支中工资、辅助工资、福利费、退休金等却在增加，如1985年为30.4万元，1986年为30.6万元；而1987年达32.8万元，占全校经费的76.8%，但直接用在教学教育上的经费却有所减少。而各种文教用品、纸张、笔墨、报纸杂志、图书、实验药品等，没有一样不涨价的，实验室、图书馆、教师办公用品等，连正常运行都维持不了，更谈不上改善办学条件了。教学改革提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清华附中规定高中一年级学生到部队参加点军训，高中二年级学生到农村参加点生产劳动，师生和家长都反映很好。可是这又要增加学校很多开支。1987年10月清华附中组织高中二年级学生350人到北京郊区一个大队参观一天，大队要收每个学生2元钱的参观费，总共要收700元，经恳切请求，获得谅解后，改为收每个学生2角后，学校交参观费70元。

1986年我在一次会上听到北京市有名的重点学校金顶街小学的校长说，他的学校多年来教师们从来没有用过一支完整的粉笔，因为经费困难买不起，每年都只能用麻袋到粉笔厂去买碎粉笔头，2角钱一斤。北京市的重点学校，经费困难情况尚且如此，一般县、乡的中小学就更困难了。湖南省桂东县二中，有初中学生500人，全校办公费每月按一个学生2角钱拨款，即每月100元，学校水电、图书、实验器材、办公用品、差旅费全部在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单靠国家拨的教育经费，恐怕连简单的再生产都很难维持，那里还谈得上发展。

一缺师资，二缺钱。普通教育的现状，怎不使人担忧！

三、为什么这样？怎么办？

我认为中学教师后继无人，教育经费紧张是长期以来对教育应有的地位缺乏正确认识，把教育看作是消费事业，教育投资长期欠账的结果。近年来国家虽然制定了教育经费必须保持两个增长的政策，但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关于发展教育与发展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教育要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做基础，而经济要发展，又必须以一定的教育发展做前提，于是孰先孰后，各执一词，好像一个怪圈，难以突破。有时一谈到教育投资，就常听到人们说，国家穷，财力有限，发展教育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何正确处理发展教育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教育经费尤其是普教经费在国家预算中到底应该占多大的比例，才能使教育和经济得到最佳的发展，这确实是关系国家建设全局的一个战略性的课题，应该组织国内外专家，认真研究国情，借鉴世界各国经验来解决。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告诉人们，智力投资（即人力资源的开发），人民教育程度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有技术的劳动力和无技术的劳动力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明显的差别。优先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是当今发展中的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关健之一。大家公认第二次大战后日本教育之迅速发展，对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起了巨大的作用。而日本的教育却正好是在战后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早在1923年，苏联经济还是很困难的时候，列宁在《日记摘录》一文中就曾经提出过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应该去满足初级教育需要的原则。他指出“使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少得简直不像话。”他提出“首先应当缩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开支，而是其他部门的开支，以便把缩减出来的款项，转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列宁选集》四卷本第四卷677页）。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1年统计年报报道，以平均值而言，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近300美元的国家，当年教育拨款占其GNP总额的3.3%；300~500美元档的占4.2%；500~1 000美元档的占4.4%；1 000~2 000美元和2 000~5 000美元档的占4.5%；5 000美元以上档的占5.8%。又据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材料，1981、1982、1983年我国人均GNP分别为290、300、310美元。根据何祚庥等人计算，30多年来我国教

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在2%左右徘徊，除个别年份外（如1960年是3.23%），从未突破3%的界限。十年动乱期间，比例低于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对教育开始重视起来，反映在教育投资上开始稳步上升，1980、1981、1982年分别达到2.56、2.59、2.67。但教育投资水平仍然远低于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人均接近300美元）的国际平均水平的3.30这一数值。其差距在0.7%左右。根据何祚庥等人的计算，我国教育经费如要达到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增加相当可观的投入。若以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5%计算，就需要增加39.4亿元。（见何祚庥、茆俊强：《我国教育经费是否超过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红旗》杂志1988年第9期。）

看来，单纯使我国教育经费达到同等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是不够的。只有大幅度地增加国家教育经费拨款，使国家每年投入教育、科学、文化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比例比发达国家的比重略高一些，我们才有可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达到将来赶上发达国家的目标。像目前这样低于同等经济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其结果只能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得愈来愈大。

当前国家允许高等学校实行有偿服务，中小学提倡勤工俭学，鼓励社会集资办学。这对于增加教育经费来源，改善知识分子生活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这只能是一种辅助措施，根本的办法还是应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

党的十三大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如果在国家预算中不大幅度增加教育科学文化投资，不明确实行首先保证基础教育的原则，上述转移恐怕是很难实现的。而当前普通教育潜伏的严重危机是很难得到根本解决的。

关于教育改革的想法

TALKING ABOUT THE ENVISAGEMENT OF EDUCATIONAL SYSTEM REFORMS

北京八中校长 陶祖伟

危机感是一切改革的起点。

近十年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就是承认经济达